

# 论教育与生活的伦理融通

■徐廷福

**摘 要** 教育与生活作为人类活动的两个重要领域,具有各自不同的伦理价值目标,遵循着不尽相同的伦理准则。从伦理的角度出发,打通教育与生活间存在的伦理阻隔,实现教育伦理与生活伦理的合理融通,能为学生的美好人生和幸福生活提供伦理保障。

**关键词** 教育;生活;伦理准则;融通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12)32-0011-03

从历史的源头看,在人类社会之初,教育和生活自然地融为一体。自从人们从生活中把教育剥离出去,将其作为一种独特的、专门的领域来对待,就开启了教育与生活相分离的历程,于是,教育开始由自在走向自觉,逐渐成为一项高度发达的事业,但在不断科学化和形式化的追求中,在社会与个体功利化的需求中,在一个无论何事都讲求“效率优先”的现代社会里,教育与生活的距离却越来越远。然而,教育与生活在目的上的一致性和内在关联性,使得教育必须关照生活、回归生活和指导生活。也就是说,在生活意义上建构教育,教育才真正具有价值。

围绕教育回归生活,近年来国内外教育学者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教育与生活的联系。但从总体上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笔者将从伦理的角度出发,试图打通教育与生活的伦理阻隔,建立教育与生活的伦理衔接。

## 一、教育与生活的伦理准则简析

教育是人类社会一种永恒的现象,学校也是现代社会重要的一项制度设计。通过教育,人类社会不仅完成了知识经验的代际传递,也实现了文化共享的伦理价值目标。换言之,学校教育制度设计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出于伦理的考虑,正因为如此,才有学者提出教育“道德起源说”的观点<sup>[1]</sup>。既然教育历来被视为人类社会一项崇高的伦理事业,在实现文化共享这一基本的伦理目标基础上,育人成才、使人向善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教育自身的伦理价值追求,自由、公正、人道等具

有普世意义的人类基本价值体系也被纳入教育的伦理准则体系,成为了教育过程中伦理保障系统的一部分,表现出教育对人的现实关照和人文情怀。

在西方哲学家眼里,生活世界是价值与意义世界的根据与源泉。也就是说,生活世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其所具有的文化价值性。“活在当下”的生活逻辑,使个体格外关注自己的生活境遇和真实体验,趋利避害、追求快乐是生活重要的价值诉求。因此,有意义的、快乐地生活成为了生活内在的伦理追求。由此可以看出,人类对于生活的基本伦理准则就是自由与责任、快乐与幸福的遵从。

由此观之,教育与生活的伦理设计理念与适用的伦理准则的确有所不同。而教育与生活的合理区隔,从社会发展的眼光看是一大进步,它有利于二者各司其职、各显其能,在建构人类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完成各自的伦理使命。

## 二、教育联系生活的两种模式及其伦理不足

在现代社会制度条件下,教育与生活的确是两回事,但也有内在的关联性,在教育史上,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斯宾塞的“生活预备说”和杜威的“现实生活说”。

### (一)生活预备说

斯宾塞曾明确指出,“教育只是未来生活的预备”,强调教育的价值就是要为一个人将来能够过上美好生活做准备。然而,究竟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年青人往往是懵懵懂懂甚至茫然。于是,成人社会出于对下一代的责任感,通过对现实生活进行理性分析,解读出现实美好生活的基本构成要素,并以此来建构学校教育

作者简介:徐廷福(1966-),男,四川自贡人,广东韶关学院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内容,也希望借此建构学生未来的美好生活。在此过程中,何谓“美好生活”、现实中“什么人”的“美好生活”能够成为解构的对象、这样的“美好生活”在未来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复制等一系列问题,都在教育者的美好心愿中被理性“过滤”掉了。“预备说”致命的伦理问题是缺少对儿童生活的现实关怀,为了儿童将来能够应对充满艰辛与挑战的未来生活,将当下儿童的学校生活“苦难化”了。

### (二)现实生活说

杜威从他“儿童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带着对儿童生活极大的现实关怀,对当时的教育提出了批评。他说,“现在教育上的许多方面的失败,是由于它忽视了把学校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这一基本原则。现代教育把学校当作一个传授某些知识、学习某些课业或养成某些习惯的场所。这些东西的价值多半取决于遥远的未来,儿童必须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他将来要做某些别的事情,这些事情只是预备而已。结果是,它们并不成为儿童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因而并不真正具有教育作用”<sup>[2]</sup>。由此,杜威提出了“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这一著名论断,从而还原了教育即儿童真实的生活这一客观事实。杜威希望儿童在教育生活中能够感受到成长与快乐,以此建立教育与生活的实质性联系。但生活的艰辛和五味杂陈并不能单靠“兴趣”去应对,教育的快乐也并不一定带来生活的快乐。相反,教育的快乐可能淡化生活的艰难,从而消解教育中对于未来生活必须具有的态度、知识和技能准备,导致青年一代在现实生活中的适应能力弱化,更遑论创造美好生活了。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斯宾塞的“生活预备说”借口未来的美好生活将儿童当下的生活苦难化,违背了自由与快乐的伦理准则;杜威的“现实生活说”虽然关注儿童当下在学校的生活体验,却忽略了文化共享的伦理责任。也就是说,教育与生活联通的两种模式都存在着一定的伦理缺陷,在伦理学意义上并不能构建一个人的完美生活。事实表明,近代以来对科学的顶礼膜拜,导致了工具理性主义的盛行和价值理性的式微,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人的精神没落的重要原因。在此过程中,教育是难脱干系的。正是基于这一点,现代思想家才主张回归原初的、完整的生活世界。因此,回到生活原点看教育,教育意义世界的建构必须立足于现实生活,离开了现实生活的需要,教育的意义难免虚空。

### 三、教育与生活的伦理衔接

教育是人类一项重要的伦理事业,通过教育建构理想的伦理社会、使人们可以过上理想的伦理生活一直是人类社会重要的价值诉求。然而,在价值多元化的当今社会里,把理想的社会伦理生活秩序的建构完全寄希望于教育已然不可能,更何况对于“应然”的理想化状态的迷恋本身已经是脱离现实。因此,只有对于“实然”状态的欣然接纳,才能帮助我们走出“画地为牢”的伦理困境。从现实入手,将教育与生活进行伦理区隔是必要的;同样,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的生活,将教育与生活进行伦理融通也是必要的。从区隔到融通,既需要撤除人们心目中自我设置的“栅栏”,更需要在生命全过程意义上打通彼此的联系通道。笔者认为,教育与生活的伦理衔接主要应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 (一)扩大生活伦理准则在教育上的适用性

加强教育与生活的联系,从理论上讲可以有两种路径:一是教育的生活化,二是生活的教育化。学界就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前者而非后者,主要是与生活的本性、前反思性有关。人们常说生活是一本厚厚的书,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打开、去阅读、去体味,我们能够从中学会许多学校里、课本中学不到的东西,这是无可质疑的,也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但是,生活这本书并非某个人能够刻意编写的,或者说某种刻意编排的生活只存在于剧本中而不可能存在于真实的生活中。因此,从实践方面而言,只能是教育适应生活而不能让生活去适应教育。

目前,对于“教育如何生活化”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探讨教育如何从生活中吸取丰富的养料,实现教育内容(课程)与生活内容的紧密衔接;另一方面,教育的生活化还致力于从方法上还原生活的伦理本色,让自由、快乐与幸福的生活氛围洋溢在教育过程中。从教育伦理学的角度来看,教育生活化就是将生活的伦理准则推广到教育中,扩大生活伦理在教育上的适用性。杜威在此方面做过有益尝试。杜威明确指出,“学校必须呈现现在的生活——即对于儿童来说是真实而生气勃勃的生活,像他在家庭里、在邻里间、在运动场上所经历的生活那样。不通过各种生活形式或者不通过那些本身就值得生活的生活形式来实现的教育,对于真正的现实总是贫乏的代替物,结果呆板而死气沉沉”<sup>[3]</sup>。从表面上看,杜威的思想为教育注入一股清新的生活化气息,让学生的校园生活变得轻松和务实;从伦理学的视角来看,杜威实质上是将生活中

注重个性化需求、自由随性、追求快乐的伦理准则引入教育中,实现教育伦理与生活伦理的对接,从而扩大生活伦理准则在教育上的适用性。

## (二)生活伦理与教育伦理的伦理融通

教育与生活毕竟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生活的伦理准则不可能在教育伦理中实现“无缝对接”。因此,在教育与生活的伦理衔接中,二者在各自坚守的基本伦理准则方面的合理融通是非常重要的。

### 1.生存与发展——生活与教育融通的伦理基础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首先要“活着”(即生存),真真实实地过好每一天的生活。如果进一步审视人的生存状态就会发现,由于个体的生活际遇不同而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生存样态,客观上也体现出了不同层次的生存境界。于是,人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境遇而寻求各种有效的途径,求助于教育是人们最普遍的一种选择。无论社会、团体还是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强烈的教育动机。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冀望教育能提升自己的智能和品德,在永不停滞的自我超越与发展中得到自我的确证。也就是说,在“活着”(即生存)的基础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尽可能“活得更好”(即发展)。这样一种伦理需求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相同的,也是生活与教育能够融通的伦理基础。换句话说,生存与发展、适应与超越是生活与教育各自坚守的伦理准则,虽然各有侧重,但从生命的全过程来看,二者前后贯通、辩证统一,应该成为教育与生活共同的伦理准则。

### 2.快乐与成长——生活与教育融通的伦理使命

生活的确充满艰辛,所以,在宗教教义中,生命的过程就是一个“受难”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快乐对于每个人来说才如此渴望,以至于让某些人(如享乐主义者)错误地将快乐视为生命的全部意义所在。但不能否认的是,快乐又是我们实现目的过程中最希望获得的一种内心体验,同时它还是一种能强化生活体验、提升自我生存状态的良好情绪。因此,如果说在生活中寻找快乐是人性所在,那么在教育中需要快乐同样也是人性所要求的。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愉快教育”、“快乐学习”等观念之所以如此令人期待,正是因为从人性意义上来讲,无论教育中的人还是生活中的人,都是希望得到快乐。当然,生命的过程较为漫长,接受各种磨难的考验也是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可以这样说,成长对于生命来说才是价值所在,快乐只不过是一个最好的“伴随物”。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并非只有教育过程的苦难化经历才能换来学生的成长和后半生的幸福,愉快的学校生活同样能够给学生带来成长的快乐

并为终身幸福奠定坚实的基础。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成长与快乐并不矛盾,二者和谐、统一正是生活与教育伦理融通所找寻的结果。

### 3.自由与责任——生活与教育融通的伦理担当

从生活伦理的角度来讲,自由、惬意的生活是人类共同追求。对于成长中的青少年学生来说,其健康成长也离不开自由的氛围。正如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所指出,学生只有通过自由选择才能成长起来,别人的选择和过分的控制只会削弱他的能力。

从教育伦理的角度来看,文化共享是教育得以存在的基本道德前提,也是教育的伦理本性所在,可以通过共享人类文明成果实现促进人的生存和发展状态这一目的。从个体意义上来讲,育人成才、使人向善是教育重要的伦理使命。因为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特设的一种专门机构(在现代社会更是一种制度化的安排),如果没有这样一种伦理责任的担当,就不能称之为教育。而相对而言,教育之所以需要自由的氛围,就是为了保障这一伦理使命能够得以实现。所以,教育必须强调“责任伦理”,因为“责任伦理”采取审时度势的态度,不但要求为自己的目标做出决定,而且敢于为行为的结果承担起责任<sup>[4]</sup>。而无论教育还是生活,都必须强调由选择机制和责任能力共同决定的责任行为,具有伦理担当的气度。

总之,现代教育被个人和社会赋予了多种价值诉求。教育可以有所作为,但的确也有难为之处。站在教育伦理的角度我们必须明白,“自由是教育的基本伦理价值,向善是教育的核心伦理价值”<sup>[5]</sup>。没有使人向善的崇高历史责任感,教育就无法担当提升人、使人的生活更加美好的伦理使命,也就降格为一般意义上的生活而无法担当起伦理责任。

#### 参考文献:

- [1]孙彩平.教育起源于人的道德——一种新的伦理视角[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3(2):28-31.
- [2]杜威.我的教育信条[M].赵祥麟,王承绪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5.
- [3]赵祥麟,王承绪.杜威教育名篇[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4.
- [4]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
- [5]李承宗,翠蓉,江辉.论教育的伦理价值[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11):40-43.

作者单位:广东韶关学院教育学院,广东 韶关 邮编 512005